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修订版)

〔德〕艾伯华 (Wolfram Eberhard) 著

王燕生 周祖生 译

〔法〕金丝燕 董晓萍 主编

『跨文化研究』丛书 (第三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法) 金丝燕 董晓萍 主编

“跨文化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修订版)

(德) 艾伯华 (Wolfram Eberhard) 著

王燕生 周祖生 译

刘魁立 审校

董晓萍 校注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 (德)艾伯华著;王燕生,周祖生译. —修订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595-3

I. ①中… II. ①艾… ②王… ③周… III. ①民间故事—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619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修订版)

[德]艾伯华 著

王燕生 周祖生 译

刘魁立 审校

董晓萍 校注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595-3

201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7/8

定价:6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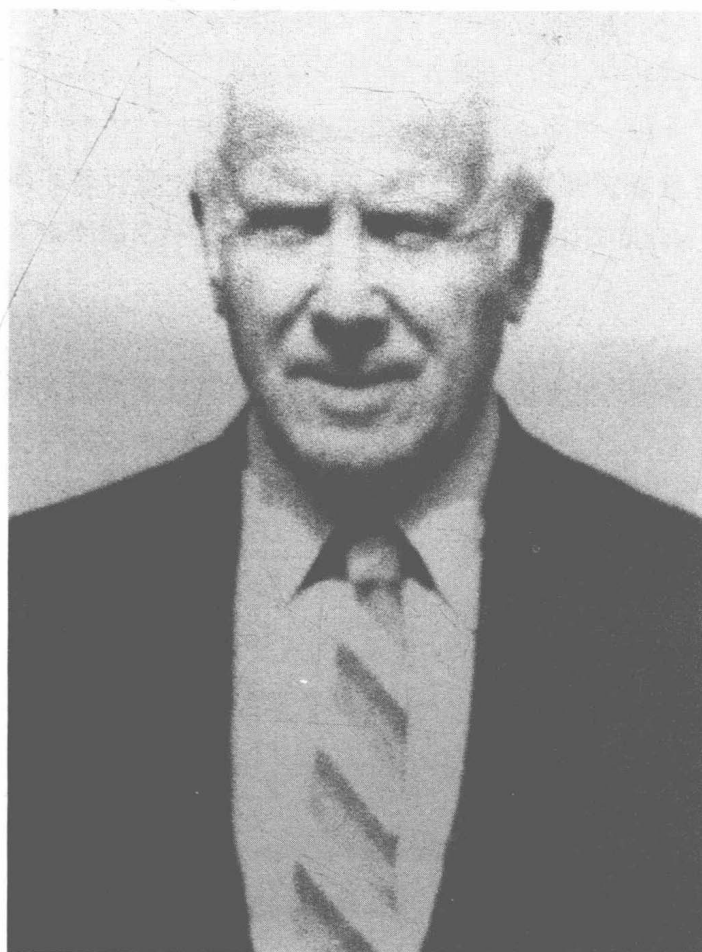
TYPEN
CHINESISCHER VOLKSMÄRCHEN

Bearbeitet

Von

Wolfram Eberhard

本书根据芬兰科学院 1937 年赫尔辛基版 (FFC120) 译出



艾伯华 (Walfram Eberhard)

本书修订版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学理论与方法论”（项目批准号：16JJD750006）综合性研究成果。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跨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乐黛云 [法]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 王宁 程正民

[法]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陈越光 李国英 李正荣

[法]金丝燕 王邦维 董晓萍 王一川 周宪 赵白生

[英]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法]劳格文 (John Lagerwey)

[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 (Ülo Valk) [日]尾崎文昭

总 序

本丛书属于教育部十三五规划“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担执行。

跨文化学发端于北京大学，学科奠基人是乐黛云先生，乐先生同时也是我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开创者，以往我国跨文化研究的成果也都集中于这个领域。在法国，由新一代汉学家金丝燕教授领衔，已经开展跨文化学科建设多年。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学科建设之不同，在于将跨文化学由原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向以中国文化为母体的多元文化研究全面推进，让这门吸收世界前沿学说并提倡平等对话的学科在中国本土扎根更牢，同时也让中国文化研究成果通过跨文化的桥梁与世界对话。这种学科的转向是经过长期准备的。

北京师范大学近年连续举办了“跨文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一级平台教学课程，乐黛云先生、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和民俗学家董晓萍教授等联袂教学，将跨文化研究向传统语言文字学和民俗学等以使用中国思想材料为主的学科推进，促进多元文化研究与跨文化学建设的整体关联理论付诸实践。令人欣喜的是，此观点得到了加盟此项目的海外汉学家的一致响应，因此，这套丛书的性质，也可以说，是在这批中外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在他们以跨文化为视野和从中外不同角度研究中

国文化的学术成就中，在经过中外师生对话的教学实践后，所精心提炼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与开拓跨文化化学学科一道，我们同步进行了跨文化化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此项工作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大力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双向推进，为跨文化化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积跬步之力，也为中外高校跨文化化学研究生的高级人才培养履行社会责任，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这个目标。

“跨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6年10月27日

中译本序

钟敬文

不矜罗马眷东方，
梦里华胥引兴长。
料想飘轮西去日，
秦碑蜀锦压归装^①。

——寄艾伯华博士杭州二绝之一
(1934年夏作于东京)

民间故事的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但是，对它的忠实记录，特别是科学研究，却是近代的事。据一般学者的说法（近年略有异义），它的忠实记录的出现，是在前世纪的初期，那就是德国格林兄弟的《民间故事集》。在将近前世纪的中叶，威廉·格林又提出了关于民间故事起源的看法，认为故事是远古神话在后世的变形物。此后，关于民间故事的见解、学说就不断地产生，如大家所知，有语言学派、印度起源学派、人类学派，以至于现代还在世界上相当流行的芬兰学派，即历史地理学派，等等。

^① 秦碑：指艾博士为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所购的碑刻拓本。

对民间故事进行类型的整理、探索，是芬兰学派的一种研究方法。自从阿尔奈等创用此法之后，它为许多国家的民间故事学者所采用。所谓 AT 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正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

中国民间故事的科学地搜集、探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兴起的。关于类型理论的介绍和仿作，更是在那以后的事。^①记得 1927—1928 年间，我和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诸位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创立了“民俗学会”，继续进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创的这种学术活动。1927 年年底，我和同乡青年学者杨成志得到了英国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学手册》（1914），我们都觉得书中所附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和《民俗学问题格》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就共同把其中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先行译成了中文，并于 1928 年刊行（稍后，杨成志译出了《问题格》）。这个小册子，一时颇引起了我和同行们的兴趣，接着，我跟赵景深都写了有关类型研究的文章发表。

1928 年秋，我从广州转到杭州工作。在那里，我在教学之余，仍继续着过去开始了的民俗学活动。我还制作了一些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分期刊载于当地出版的《民俗》周刊上，约五十余个，后来汇合起来，题为《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初刊于《民俗学专号》（即《民俗学集鏤》第一册，1932），后来译成日文，承日本神话学者松村武雄等的好意，刊载于他们创办的《民俗学》月刊上（1933）。据关敬吾博士后来的回忆，它曾经引发了他对民间故事进行比较研究的念头。

①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学者戴尼斯（N. B. Dennys）在他的《中国民俗》（*The Folklore of China*）一书中，已有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试作，但因为数量无多等原因，未曾形成气候。

我对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制作活动，后来因为学术上的注意点和对故事类型的作用的看法有些变化，没有一直进行下去。想不到，这种工作却由一位西方青年学者把它完成了，而且完成得那么漂亮！这就是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博士于1937年用德语写成、并在芬兰首都发表的这部著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以后，这项工作沉寂了数十年。直到70年代，才出现了美籍学者丁乃通教授在同一地域发表的一部新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80年代以来，曾有些日本新起的“中国学者”加藤千代、马场英子等女士，颇有意于着手撰写这方面的新著，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如愿。现在正在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木立子女士，有志进行中日民间故事类型的比较研究，倘能成功，那她的成果，将是这方面的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

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是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的一种具有相当意义的学术工具书，它也是百多年来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一部比较有价值的中国民俗学力作。

这部由德国学者所撰写的故事类型学著作，尽管是在种种限制的条件下出现的，但是，它却具有一些使我们不能忽视的特点和优点。在这里，不妨略举一二谈谈。

首先，它是把中国的民间故事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并按照中国故事的特点加以概括而写成的一部著作。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尽管要受到别的民族（特别是周边民族）的文化或多或少的影 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它总该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性格和风貌，尤其像中国这样历史文化悠久、地域广阔的民族国家，它在文化上的这种特点，无疑更要显著些。从这点上看，中国传承的民间故事，虽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接受过邻近民族民间作品的影响（例如印度、阿拉伯等），但是，中国更多的民间文学

作品，则是在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相关民族心理的土壤上发育和茁壮生长起来的。即使那些从外族移植进来的作品，也必然要在流传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被本民族化（即中国化）。换一句话讲，就是它大都要具有中国特有的艺术精神与风致。因此，制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首先必须具有这种理解，而后根据它去操作，才可能合理。关于这一点，别的学者也许有不同的主张。但是，艾伯华博士却是坚持了这个宗旨的。近年所接触过的一些国际同行，在谈话中，也大多承认这一点，并对艾博士的学术工作给予了赞许。

其次，本书所提供的类型是相当丰富的。它共收有类型 200 余个（正格故事类型 215 个，滑稽故事类型 31 个）。它所使用的资料，比较限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一带的省份，但是，中国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故事，大多数已经包含在里面了。作者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占有大量的资料，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个愿望，还不那么容易。如前文所提到的，20 世纪 30 年代我费力所草成的中国故事类型，不过五十余个；数年之后，一位外国青年学者，在短短的数年里，竟完成了这样一部超过将近几倍分量的专著。六十多年后，我回顾这种学术史迹，实在禁不住赞叹和惭愧之情。

再次，著者在本书里，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类型，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对中国民间故事各方面事象的见解（包括对它的考证等），这些，从他的《前言》到许多类型后面的附记中，都随处可以见到。而且，像《前言》里所叙述的某些意见（例如，说中国民间故事的母题是富有生命力的，在现在还能形成新的民间故事、轶事之类），直到现在，还是值得参考的。总之，著者在这里，并不甘心于使他的书只成为提供给故事的比较研究者一些宝贵参考资料的检索文献，而是处处要以一个有自己见解的故事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此外，书中附录的设置，也显示出著者的用心的精细和工作的周到。这些长处，就不一一多说了。

总之，这是一部用力甚勤、收获不小的学术性著作。当我们想到当时种种有限的实际条件时，对此书所获得的成就就不能不更为赞叹了。当时的情景到底怎样呢？从客观方面说，那时，中国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还处在开始阶段，而且已发表的资料还相当分散，难于集中。我是比较勤于收集资料的本国学人，但是，就我所得到的，也到底有限，这是可以从我所编制的故事类型中看得出来的。这样的困难，对中国学者来说尚且棘手，何况对一个外来的学者呢？再者，艾博士当时还不过是年不满三十的青年学者，学殖和经验还都不够充分，而他在短短的几年里，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这委实是不容易的。如果不嫌夸张一点地说，他的工作，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学术上的“奇迹”吧。

这部值得重视的著作以德文出版后，在东亚民俗学界，尽管一直没有一个译本，但是，在不少能够阅读德文的学者的自己的有关著作里，它是经常被引用的，这也正说明它的学术价值所在吧。

我跟艾博士虽然很早就互通信息，却始终没见过一面。这的确是一件憾事。但是，我们的学术友谊是弥足珍贵的，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像前文所说的，1928年秋天，我到了杭州，仍然继续着在家乡和中大时开始了的民俗学的工作。1929年春，已经编辑了《民俗》周刊。次年，又与友人创建了“中国民俗学会”。那时我们的劲头很大，还刊行了《民间月刊》及一些民俗丛书，并广泛召集同志（会员）来参加工作。当时，北大的歌谣学工作早已停顿，中大的民俗学活动也因人事的变动暂时趋于冷落。我曾在《中国民俗学运动歌》（1932）里说：“但现在啊，园丁不到，赏花人更是寂寥。”描述

的正是这种情形。然而，各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风所吹醒的知识青年们，这时却涌起了爱护乡土文化的热忱。他们对我们的民俗学工作表现了共鸣，还在本地进行了同样的工作——收集资料和刊行小型民俗书刊等。于是，杭州，差不多一时成了全国民俗学活动的中心。在这同时，一些外国的（主要是日本与德国的）同行，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工作，与我们建立了通讯关系，互相寄赠刊物。在这中间，艾博士是最积极、最热心的一位国际朋友。他自动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寄来他们所办的刊物《宇宙》和他的学位论文（关于中国天文学史的），还为我们的刊物写过稿子。这对我们当时的工作是极大的鼓舞！它使我们体会到“德不孤，必有邻”的真理。

1934年春，我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到东京进修民俗学、神话学的学问。就在这年夏天，艾博士为柏林人类学博物馆来华购办民族志的物品，自然，也有藉此来中国进行学术考察的用意。他到了中国，到了杭州，见不到我，心情颇有些惆怅。那里的友人在给我的信中报告了这种情形。我也同样感到惆怅，我在寄给他的诗中说：“闻说藕花湖畔路，怀人东望立多时”，既是体会到一位客居友人的心情，也宣泄了我自己这个不在家的东道主的同样心绪。

1936年夏，我从日本回国，这时，艾博士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可是，我们没有通信。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一晃就是八年！接着是国内的解放战争。其间，我个人以政治的关系，又流亡香港。全国解放后，因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视，政府采取了闭关的政策。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相隔绝，在学术上也互不通气了（“文革”后期，略有些松动）。而在上说的这段时间里，我跟艾博士的联络，是彻底地断绝了，真有“生死茫茫两不知”之感。

记得在“文革”将要结束的那些时候，有一天，从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转来了一封西德学者的信。寄信者是该国《民间故事大百科全书》的主编。信中附来了关于我的词条的拟稿，希望我给核实一下，以便刊载。那词条末端的执笔者的签名正是艾博士！这当然给我以意外的惊喜。因为，它等于告诉我，我们虽然都老了，但还彼此都健在；其次是故人没有忘记我，竟郑重地为我写作了词条——词条的内容，主要介绍我的出身、简历和解放前的一些著作（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等）。后来，我陆续从国外来访的学者口中，略知艾博士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任教，有时还到台湾旅行，并仍热心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等。我听到后，自然在心里是为他喝彩的。

80年代前期，有一位菲律宾在华教学的女专家，在她届满将要回国之前，托人带信给我，说一定要见见我。当我跟她晤谈时，问到她非见我不不可的理由是什么？想不到，她的回答竟是受了艾博士的影响。她说，艾博士认为，在大陆的学者中，我对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的态度是忠实可靠的。这使我大为感动，但在感动之余，也感到他对新中国这方面的事业有些误解。再后来，美籍华裔学者洪长泰来北师大访学，临返美时，我托他带了一些自己的近著和时下出版的忠实记录神话的资料本，目的是想增进艾博士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记录民间故事工作的理解。谁曾想，当洪博士把书转送给他时，他已经去世了。这件事，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有说不尽的遗憾。

前几年，美国衣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席金在温（Kim Jae-on）教授，来北京寻找关于东亚学术研究的合作者。他是加州大学出身的，曾经是艾博士的学生。当谈到合作项目时，我想起了艾博士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这部著作，就向他建议合作翻译、印行此书。我说，艾博士这本书，虽然是旧著，但还没有丧失它的使用

价值。您是著者的高足，我是他早年的学术朋友，我们就合办这件好事吧。他欣然答应了。我们就开始运作。现在，这部译稿总算即将出版了。它得以汉文的形式，与东亚学界的广大读者见面，这将不但使中国学者从中得到好处，就是对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也将会有所裨益。我想，艾博士若泉下有知，是一定能为他的这本著作在东方的广泛传播而感到欣慰的。

临末，我要向与我们合作出版艾伯华德文原著的美国衣阿华大学表示衷心感谢！是他们提供了关键性的赞助资金。一并诚挚热心促成此事的衣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席金在温教授！

我还要提到我们的国际学术友人、美国衣阿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欧达伟（R. David Arkush）博士。欧教授曾于1996—1997年来华进行研究，其间，应我方之邀，协助校正艾氏原著中的全部威妥玛注音，还把索引中的威妥玛拼音换成现在中国通用的汉语拼音，这使这部译著能够在中文读者中间发挥它的实际学术作用。欧教授已于去年回国，藉此机会，我也要向他遥致一份真诚的谢意！

在这里，还要感谢本书的德文翻译，北京大学的王燕生和周祖生教授夫妇！刘魁立教授对全书的译稿进行了审校工作。他的审校，使本书的专业研究水平得以再现，兹特致谢！

还要向承担了本书的电脑录入工作的研究生严优和庞建春道谢！两位同学工作兼求知，其志可嘉。

董晓萍教授劳心费神地承担了全部译著的统稿工作，并协助我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虔诚的感谢！

最后，我要向商务印书馆郑重致谢！如果不是他们独具慧眼，迅速地接受了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问世，恐怕至今还是一个梦。

1998年3月于北师大励耘红楼，时年九六。